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九至十六号

(1945年5月—1945年8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九至十六号

(1945年5月—1945年8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四卷 第九號

續後請贈前方將士



三十
四
年

商
務
印
書
館

新
書
出
版

五
月
份

第一 · 二 週

中國哲學發展新原道(一名中國哲學之精神) 書乙集之二 馮友蘭著 定價二元二角	此書為馮先生貞元之際所著之第五種。書中所述中國哲學史中各主要派別之精義，以明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之地位。已讀馮先生之「新理學」者，不可不讀此書；已讀馮先生之「中國哲學史」者，亦不可不讀此書。
部定大 學用書 中國政治思想史(一) 蕭公權著 定價三元五角	本書採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敘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以時代為經，以思想為緯。取材既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論價值者為主，影響較大之政論亦酌量選及。可作為大學政治系教本之用。茲先出上冊；餘冊續出。
戰後美國國民教育 美國全國教育會編 曾大鈞譯 定價一元四角	本書討論美國在戰後國民教育的適當目標，並提供各種的具體計劃。對於退役官兵與職工人員的訓練與救助，及實行本計劃之人事與經費問題，計劃尤為詳盡。可為留心我國戰後教育設施者的參考書。
蘇聯概觀 Monice Jobb著 編木琦譯 定價一元四角	本書以極淺顯簡潔的文字敘述蘇聯的一切：蘇聯的歷史演變，資源和民族，政治制度和今日工業和經濟生活的組織，社會生活、教育、文學和藝術。可以說是一部簡明的蘇聯通史，亦是一本認識蘇聯的通俗小冊子和教師的參考書籍。
近代哲學的精神 Josiah Royce著 樊星南譯 上冊定價三元六角 下冊定價三元五角	書分兩部。第一部為「思想與現實之研究」，用邏輯與一般演繹的方法來討論。第二部為「理想與現實之研究」，內容涉及自然科學與道德秩序等。全書以演繹方式為用，極易引起問題與興趣。
人事心理研究社 義第六種 Charles R. Gow著 張振鐸譯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從心理學的觀點並根據實驗的成果，指示從事於各種職業的人們如何獲得與人合作的途徑，及如何以適當的方法解決一切繁雜事件，書中所引事例，既信而有據，亦饒興趣。
國民經濟研究 究所內種 義第六種 工業化與中國人口問題 劉鴻萬著 定價一元	本書首對我國人口之重要與兩方面之狀況逐一加以檢討，繼而明其與工業化之關係，繼而知工業化對此種狀況發生何種作用，而此種狀況對工業化又有何種影響；最後乃討論解決此種問題本身之方針。
普通地質學 孫繼祖著 定價三元八角	本書對地球之生成組織，變遷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物進化作有系統之敘述。取材於理論之外，尤重實例，而實例之選擇則以本國所有之材料為限。可作為太學地質學之教科書或參考書。

費運加另外點地刷印 售發倍十六百壹價定按均書各列上
(面封底接下)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民主政治……杜光墳（一）

算學啓蒙流傳考……嚴敦傑（三一）

環境民族與制度……潘光旦（六）

中國古代之土壤地理……施雅風（三三）

從羅斯福總統談到新時代的政治家……周綬章（八）

中國偉大旅行家徐霞客……方肖矩（三六）

現代法學之特徵……阮毅成（一〇）

滇北風土誌……賀益文（四九）

論十八世紀英國政論新聞學……曹亨聞（一七）

史迪威公路與皮克將軍……杜若譯（五四）

個性主義與英國教育……朱有燾（一九）

記空軍第五大隊出擊南京……鄭光昭（五七）

回教社會學家伊本·哈勒敦……陳定閔（二二）

柴霍甫底兒童愛……汪家正譯（五九）

進士之出路……周蔭棠（二六）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九號 目錄

東方雜誌

第四十一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民主政治……杜光墀（一）

算學啓蒙流傳考……嚴敦傑（三一）

環境民族與制度……潘光旦（六）

中國古代之土壤地理……施雅風（三三）

從羅斯福總統談到新時代的政治家……周綬章（八）

中國偉大旅行家徐霞客……方肖矩（三六）

現代法學之特徵……阮毅成（一〇）

滇北風土誌……賀益文（四九）

論十八世紀英國政論新聞學……曹亨聞（一七）

史迪威公路與皮克將軍……杜若譯（五四）

個性主義與英國教育……朱有獻（一九）

記空軍第五大隊出擊南京……鄭光昭（五七）

回教社會學家伊本·哈勒敦……陳定閔（二二）

柴霍甫底兒童愛……汪家正譯（五九）

進士之出路……周蔭棠（二六）

三十四年 重版書 五月份

小叢書探	世界文	自然科學	法幣	通貨	中國政治	農政	工商組織	中山和	戰時經濟	民主政治	隋唐制度	文史	今日	中國	中國	人	三民	昆蟲	小叢書	附註
工學	文	農具	文	新論	概論	治學概論	與管理	李之條	經濟	之現在與將來	淵源略論	中國農佃問題	的化學	國難害蟲	國難害蟲	生藝	主義新論	昆蟲	宋	中國行
程	的來信	具	文	論	要	論	理	述	學	論	論	題	學	蟲	蟲	藝	論	記	曲	史
胡榮銓	Stefan Zweig	顧復	馬	馬	許崇清	劉農	楊端六	吳	A. P. Pignon	徐	陳寅恪	王	W. McPherson	黃	劉	陳	崔書琴	王	王	王
著	原著	譯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一・八〇	八〇	一・五〇	二・〇〇	一・九〇	四・四〇	三・六〇	五・四〇	三・四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二・二〇	二・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	四・六〇	七・〇〇	二・〇〇	一・四〇	四・六〇

一九一〇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民主政治

杜光墀

民主主義運動之發生原所以限制政府之權力，以保障人民之自由，但是達到了戰爭，為爭取最後之勝利，卻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以伸張政府之權力，而使民主政治歸於消沉。(註一)遠者如古希臘、羅馬時代之因發生戰爭，而改變其民主制度的往事，即使置之不論，就是到了近代的民主國家，也不乏戰爭時期，民主政治歸於消沉的例子，譬如美國於內戰發生以後，林肯總統之利用戰爭權，在戰區以外，廢除人民出庭狀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逮捕通敵的人們，和取締紐約世界日報 (New York World) 及芝加哥時報 (Chicago Times) 都是民主國家達到了戰爭，為爭取最後勝利，而限制其人民自由的事實。(註二)一九一七年美國實行參加歐戰後之限制人民自由，以伸張政府的權力，較之內戰時期，有過之無不及，國會之通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日聯邦政府管理食物燃料法 (National Food and Fuel Control Law) 以取締：(一)故意破壞生活必須品，以抬高物價，(二)減少供給，或存心浪費，(三)企圖壟斷物品之供給，或限制出產及運輸工具，以及(四)減縮必須品之生產，以抬高售價，自然是限制了人民自由。(註三)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國會之通過間諜法 (espionage law) 以懲處：(一)對外國傳遞消息，損傷美國者，(二)故意製造或傳播不確實之言論以傷害美國或資助敵國者，(三)故意造成美國陸海軍中之不忠實，不服從，叛變或拒絕擔任職務者。(註四)

和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之通過懲治叛變法 (Sedition Act 1918) 以懲治用謾罵口吻，非難政府者，倡言或鼓動減少戰時生產者和以語言及文字資助敵國者等一類的法令無一不是限制人民的自由，(註五)而一九一八年國會之通過歐弗曼法 (Overman Act) 授權總統調整行政機構，更違背了美國民主政治的作風，米爾頓說：

歐弗曼法所授予總統威爾遜權力之大遠過林肯總統所曾實行的。(註六)

在第一次大戰時期，民主國家之限制人民自由，改變民主作風者不只是美國一個國家，英、法和瑞士幾個歐洲民主國家大概都實行過這種限制人民自由的辦法，(註七)所以哥倫比亞大學麥克本和羅哲士兩教授於論到大戰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時曾說道：

當那幾年血戰的時期，就是素來以民主主義號召於世界的，也不惜犧牲多年的主張，而採取獨裁的手段，以求戰爭的勝利，因此國家的元首便操縱國事，把持政權，而成了指揮一切的狄克推多，同時各國議會都失去了他們對於政府的監督權，而成了贅疣一般的具文，除了政府便宜行事外，人民幾乎沒有自由之可言。(註八)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民主國家政府之便宜行事，限制其人民的自由，誠然改變了民主政治上傳統的作風，而自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後，軸心國家之先後吞併了若干民主國家，更動搖了民主政治之基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掀起大戰後，沒有二十天的工夫，擊敗了波蘭，一九四〇年在四五兩個月之內，佔領了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幾個西歐民主國家，一九四一年的四月滅亡了南斯拉夫和希臘兩個東南歐洲的民主國家等等事實都是民主國家日趨沒落的象徵，而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德軍之攻陷巴黎，破壞了第三共和的根基，不只是推翻了法蘭西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而且還動搖了世人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心。經過敦刻爾克戰役之後，英法雖然還勉强獨存，但是他們的民主政治，也頗有轉趨消沉的趨勢，張伯倫政

府之推行緩靖政策，縱容德、意、日和西班牙等獨裁政府，威脅民主政治，是象徵英國民主政治之趨於消沉，而勞易貴族(Lord Lloyd)之滿口稱道法西斯蒂政府之成績，更充分的證明英國政府當局之傾向反對民主政治。(註九)就是到了挪威棄守，張伯倫被迫辭職，邱吉爾繼起組織的混合內閣之中，仍以接近法西斯蒂的張伯倫，哈里法克斯和西門盤據政府的要職，還在表示英國政府中反民主政治的潛在勢力。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之後，資本主義為排除其阻力，保障其權益，也轉而傾向法西斯蒂主義，參議員休郎(Senator Huey Long)在路易西安那州，泰爾馬居州長(Governor Talmadge)之在佐治亞州，海格市長(Mayor Hague)之在澤西市(Jersey City)之以法西斯蒂的手段，推行法西斯蒂政策都是象徵美國民主政治之消沉。(註一〇)所以拉斯基教授(Prof. Leask)說：

我以為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後，所謂美國形式上接受民主政治源則之下，法西斯蒂思想深入美國商人階級的言論，並不算過甚其詞。(註一一)

一九三四年二月巴黎暴動(Paris Riot)以後，法國法西斯蒂勢力之膨脹一日千里，由壓迫社會黨人而激起的幾次事件，充分的反映法國民主政治之消沉。而一九四〇年巴黎之陷落，其當、拉佛爾和達爾郎等諸人之結合起來，成立維琪政府，自然是由於他們之懷疑民主政治，而法國多少人民之容忍維琪政府之存在，更顯示法國人民厭棄民主政治的心理。(註一二)

但是『物極即返』、『盛極必衰』，這是物質變化之至理，政治興亡之定律，況且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獨裁者流，橫行霸道，自取滅亡，目前東西合圍之勢已成，柏林陷落，指顧間事，日本處在四面楚歌之中，除了無條件投降，再沒有其他的途徑，而今法蘭西、比利時，和捷克斯拉夫已經踏上了恢復民主國家的坦途，波蘭、希臘和南斯拉夫也都建立了重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三國都已經脫離了有心國家的羈絆，而歸服到民主國家旗幟以

下，將來自然都是走向民主政治的途徑。英國因見於法國兵敗國亡的慘禍，以及軸心國家之威脅，激起了我們愛護國家的觀念，擁戴民主的思想，內而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團結各黨，組成混合內閣，貫徹作戰政策，外而聯合中、美、蘇等民主國家，結成民主陣綫，對抗軸心，形勢轉變，民主抬頭，英國政治也轉而傾向民主主義的潮流，(註一三)拉斯基教授有言曰：

以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的情形而論，不能不謂為英國民主政治之復活。(註一四)

一九四〇年美國之打破多年傳統的慣例，選舉羅斯福連任三次總統就是代表美國民主主義擁護羅斯福，以對抗軸心國家的思想。(註一五)而戴高樂將軍之領導戰國法國，以集中法蘭西民主抗敵份子，參加聯合國家共同抗敵工作，乃是法國民主主義的勝利，(註一六)從此軸心沒落，民主勝利，世界之大，都成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

英美二大民主國家到了戰爭時期，為贏得最後勝利，都會採用限制人民自由，以伸張政府權力的方法，只因他們民主政治根基深厚，雖經實行限制人民自由，但是並沒有怎麼改變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

美國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對德日宣戰之後，不久就由國會通過了戰爭法(War Act)授權羅斯福總統以策劃對軸心作戰之非常權限，其中包括：(註一七)

一、改組聯邦政府各部門之權，
二、對於收發郵電通訊建立檢查之權，
三、統制規劃或禁止有關美國及其人民之國際貿易之權。

戰爭法之授權羅斯福總統以改組聯邦政府各部門之權已經侵及了國會法定的權限，而予以檢查郵電通訊之權更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制止通貨膨脹法也侵及了國會的權限，和人民的自由。以一九四一年的戰爭法和一九四二年的制止通貨膨脹法而論，戰時美國雖是也改變了數多年的民主作风，但是經過三

四年的戰爭，國會兩院還保持他大部的權力，各級選舉還是照樣舉行，人民普通選舉還是繼續有效，各級法院還是實行他們的檢查主張之權，羅斯福總統雖是由戰爭法取得非常大權，但是他並沒有利用他的權力消滅了他的反對派，排除了工人團體。而一九四四年總統選舉之照常舉行更足以表示美國民主政治的精神。(註二八)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羅斯福總統三屆總統任滿之前，適在戰爭緊急關頭，進行選舉，不無困難，而為便於聯合作戰，也不容隔陣易帥，半渡易馬，致失聯合國家間已成的人事關係，且近年以來，羅斯福聲望之隆，早已壓倒其他黨的候選人，羅氏之四次連任，在選舉之前，早成定論，又何必多此一舉的經過此種選舉的形式呢？情形雖然如此，但是從未聞羅斯福借口戰時情形特殊，停止選舉，延長其任期，以造成美國的狄克推多，益足以證明美國民主政治之難能可貴了。(註二九)但是考之美國歷史，也非偶然，據史學家畢爾德教授(Prof. Beard)說：

從來沒有一個狄克推多企圖竊取美國的政權。當年華盛頓以他個人的聲望，很容易的躋居於國家政治舞台的主人地位，但是那種作風完全違反弗吉尼亞(Virginia)君子——指華盛頓——的精神。國會幾次的授以國家大權，但是他總是按時奉還，從沒有企圖竊據政權的野心。(註三〇)

戰爭法及制止通貨膨脹法雖是剝奪了國會一部的權限，但是國會還保有他大部份的權力，譬如每年預算還是依法由國會兩院通過，普通法律還是依照立法手續，經由國會兩院通過，而宣戰及同意締結條約之權還是操在國會及參議院手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日、德、意三國之宣戰，都是經過國會兩院通過的。關於對日宣戰一案，據十二月八日合衆社華盛頓電稱：

衆議院以三三八票對一票通過對日宣戰。
同日海通社斯德哥爾摩電稱：

參議院以八八票對零票通過對日宣戰。
對德、意二國之宣戰，也是經過同樣的程序，在珍珠港事件爆

發，戰爭萬分危急的時候，而對日、德、意之宣戰都是照樣的經過國會兩院通過，充分的證明美國憲法上宣戰條款之繼續有效。

近年以來，美國總統雖是利用訂定行政協定的方式，擺開了參議院同意的限制，而締結了多少種對外協定，但是戰時一切正式條約沒有不是經過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的。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參議院之通過中、美新約和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參議院之通過廢除限制華僑的移民律，就是參議院同意締結的兩種條約。而最近美國之發動修正憲法上由參議院同意締結條約的條文，為由參眾兩院同意締結條約，擴大國會監督政府締結條約之權，更象徵戰爭時期美國民主政治之進展。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總統提出之大使、公使、領事，最高法院推事，以及聯邦政府其他官吏經參議院之同意勸告任命之」的規定，雖在戰時，還是照舊有效。關於任命前任副總統華萊士繼任商務部長一案於提經參議院同意時，大遭參議院之反對，參議院反對華萊士繼任商長之激烈幾使該項任命案為之推翻，參議院在戰爭時期，而仍能如此行使其同意任命權，足徵戰時參議院監督政府力量之一斑了。

英國為實行議會政治之國家，政府對議會負責，議會高於一切，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後，議會未加改選，政府之組織似乎不足以反映英國戰時的民意，但是幾年以來，補缺選舉(Bypollion)之相繼舉行，也是英國民主政治的一點表現。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國會兩院之於一日之內通過了國防緊急權力法授政府以獨裁權力，並得不經國會通過，而修改現行各項法令，以應戰時之需要，雖是剝奪了國會一部份的權力，但是幾年以來，議會兩院還是英國政治的重心，舉凡一切財政，立法以及監督政府各種權力都還操之於議會之手，而議會之批評，辯論還是指導政府有力的武器，誠如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張伯倫首相在下院闡述挪威戰事的演說中，曾論及此點說：

此非徒事爭辯之時，吾人必須團結全國，竭盡每一分之力，以增進吾人之武力，爭取最後之勝利，政府之軍事顧問曾鄭重勸告

吾人根本勿作此項辯論，並申述其危險，但吾人未接受此項勸告，蓋民主國不能無批評，且必須容許批評提出辯論理由。

在丹麥棄守，挪威撤退，荷、比危在旦夕，英國也岌岌自危的時候，張伯倫首相之不顧軍事顧問之鄭重勸告，而容許議會之批評，於此見出英國戰時的民主精神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邱吉爾首相在下院演說也曾論及戰時下院的重要：

我想要進行此種戰爭如果沒有下院的幫助和指導，簡直是一種超人的任務，我從來沒有認為下院的辯論和批評是一種累贅和負擔，我也許完全不同意此種批評，我也可以被他鬧得頭昏眼花，並且我也可以對他感覺憤慨，我甚至可以予以反駁，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重大問題的辯論對於全國人民生活之加強實有極大的價值，並對陛下政府有極大的幫助。

邱吉爾首相由國防緊急法獲得獨裁權力以後，而仍如此推重下院，益足以表示英國下院地位之重要了。

英國為實行責任內閣制之國家，政府之進退皆視國會之去捨，大戰爆發以後，雖因一九三五年選舉之國會再延長其任期，而延續現政府之存在，但是五六年來，英國政府之幾番改組大概都是出於議會的要求，一九三九年戰事爆發後，張伯倫首相之所以約請邱吉爾加入他的戰時內閣，固然是由於他個人集中人才的意見，同時也是因為議會的要求。一九四〇年歐陸戰事失利，英國朝野震動時，張伯倫政府之辭職，以及邱吉爾之成立混合內閣都是議會要求的結果。(註二)而一九四一年五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下院因為巴爾幹和新加坡戰事失利，攻擊政府作戰方略，而促使邱吉爾改組其戰時內閣，更足以表示下院進退政府人員之力量了。所以戰爭時期，並沒有削弱了議會進退政府的權力。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邱吉爾答覆下院質問時說道：

下院乃絕對之主宰者，倘下院不信任政府，倘認政府作戰有誤，倘認可以設法有效作戰，則下院自可以正確而合乎憲政之方式，表達其意見，此不但為下院之職責，亦其應有之權利。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邱吉爾又在下院裏說：

下院之職責即在支持政府或改組政府，倘不能加以改組，即應予以支持，在戰爭時期，決無中庸之道，余等諸君之僕役，諸君有權革除余之職務，

在戰事緊急時期，而首相自認為下院之僕役，並尊稱下院為絕對主宰者，具有革除政府職務之權力，還不足以證明戰時英國下院進退政府的力量麼？

除了進退政府之外，英國議會還享有質問及不信任投票等幾種監督政府的權力，這幾種權力雖因戰爭時期，下院開會次數之減少和對下院質問辯論加以限制的關係，而減少了行使這幾種權力的機會，但是幾年以來，戰爭並沒有怎麼削弱了議會質問和不信任投票的力量，而提出質問更是議會通常監督政府，鞭策政府的一種武器，近年以來，每逢戰事逆轉，或發生政治糾紛時節，下院議員都是紛紛的提出質問，其目的所在，不只是在於追求問題之解答，而乃是表示其批評政府的態度，譬如在敦刻爾克撤退，地中海戰事失利，北非戰敗和星洲棄守後，下院議員之激昂慷慨的責難政府，質問政府，迫使政府無地自容的狼狽情形，都是現代史中，英國下院行使其質問權顯著的例子。

不信任投票之影響比較嚴重，所以英國議會舉行不信任投票的次數較之質問為少，但是第二次大戰爆發以來，已經舉行了幾次的信任投票。譬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二日邱吉爾戰時內閣組織成立，在下院發表演說後，上下兩院都通過信任政府案，據五月十三日倫敦路透社電稱：

新首相發表其震動一時之演說後，下院即以一八一票對零票通過對政府表示信任，……上院今日亦全場無異議對新政府通過信任案，其措詞完全一致，略謂「國會認為新政府確能代表全國力量之集中，對德作戰，直至獲得最後之勝利時為止。」

一九四一年五月英國以派遣軍隊援助希臘之政策要求議會予以信

五月六日上下兩院通過了對邱吉爾政府之信任案。

一九四二年一月議會看見於星洲戰爭之失利，乃於二十七日舉行戰局辯論，反對意見集中攻擊邱吉爾政府作戰方針，邱吉爾說：

余有另一理由要求此次戰爭中不屈不撓之議會舉行正式神聖之信任投票，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而率直之投票，則下院即為怠忽其職務。

經過三日辯論終結，邱吉爾向下院提出動議如下：

本院對於政府具有信心，決盡全力協助政府，勉力作戰。

上項信任投票經下院於一月二十九日以四六四票對一票的絕對多數表決通過。

一九四二年六月多不魯克撤退，北非戰局失利，議會輿情沸騰，對於政府大興問罪之師，下院議員米爾納等二十五人提出對政府不信任案如下：

下院對於帝國軍隊於非常困難情況下所表現之英勇及毅力，深表敬佩，然對政府之指揮作戰則不信任。

米爾納等二十五人所提之不信任案以四七五票對二五票為下院所否決。

一九四五年二月克里米亞會議對於波蘭領土及政府所採取的決議深為英國下院所不滿，於是邱吉爾混合內閣的奧黨份子之中，也有了反對的意見，邱吉爾為表示英國團結一致，乃於二月二十八日要求下院表決對於政府之信任案，據三月一日倫敦廣播說：

英國下院今日以四一三票對零票一致通過對政府之信任案。

自一九四〇年五月邱吉爾奉命組成戰時內閣以來，不過四年多的時間，而英國議會已經幾次的通過信任投票和否決不信任投票，並沒有因為戰時時刻，而停止了國會對於政府的信任投票權，信任投票為議會監督政府一種有效的工具，遇到戰爭，而仍能照常行使，還不足以表示英國的民主精神麼？

戰爭期間，國會之提出質問以及舉行信任投票以實行監督政府，

是英國民主政治的表現，而每逢發生重大軍事政治問題時，政府之向議會提出報告，並由議會舉行戰爭和政治辯論，以使議會表達其意見，也是英國民主政治的作風，譬如卡薩丁郎克、開羅、德黑蘭、魁北克、莫斯科、克里米亞羅耶會議，邱史會議，羅邱將會議，和羅邱史會議之後，邱吉爾回到國內，總是到下院裏，報告會議之經過，如果他個人因事不克躬自報告時，如開羅、德黑蘭會議後邱吉爾因臥病北非，未能即時返國，便由戰時內閣的代理首相阿特利，和下院代理領袖艾登代替邱氏出席報告。關於印度問題，自克利浦斯街命赴印，以至今日，每逢發生重大波折，政府也是在下院提出報告，在下院裏政府之報告軍事政治就是英國民主政治的作風。而於近年以來，每次遇到了軍事失利，為平息國民輿情之沸騰，解答議員之質問，政府之由議會定期舉行辯論，以使議會循合法之方式，表達其意見，也是民主政治精神的表現，譬如希臘戰事之節節失利，北非戰役之連戰連敗，以及星洲戰爭之慘重失敗以後，英國議會議員之激昂慷慨，牽起責難，而一經議會之辯論，幾次軒然大波，消弭無形，不僅表示英國的民主精神，亦且足以顯示民主政治方式消弭政治紛爭的功能。

(註一) Laslet, H.: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Present Time p. 315

(註二) Millson, G. F.: The Use of Presidential Power 1760-1943, p. 114

(註三) Beard, C. A.: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 335

(註四) Beard, p. 336

(註五) Beard, p. 336

(註六) Milton, p. 221

(註七) Mc Bain Roger L.: New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p. 21

(註八) Mc Bain Roger, p. 1 杜光坦譯：憲政制度之新問題，頁一。

(註九) Laslet, 154-155

(註一〇) Laslet, 147

(註一一) Laslet, 147-148

(註一二) Laslet, 136

(註一三) Laslet, 137

(註一四) Laslet, 137

(註一五) Laslet, 137

(註一五) Lielt, 197

(註一六) Lielt, 198

(註一七) 大公報，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一八) Buell, R. L.: New Governments of Europe, p. VII

(註一九) 杜光垣：羅斯福總統四次當選與美國民主政治，東方雜誌，四十一卷。

環境民族與制度

潘光旦

環境、民族、制度是一個不可分的三角關係的三邊。當其初，這三邊並不是同時存在的。環境當然是最先存在。人類、或各個不同的種族、或後來的各個民族，原是生物在此環境中演變而成的一個結果，是後起的。人類為求自身的位育，把智能用在環境上，於是才有文化和制度；文化和制度顯然是三邊中最晚出的一邊。不過，三邊都經演出以後，它們卻一貫的維持着極密切關聯。最初祇是環境影響人類或民族，後來民族也就影響環境。起初祇是民族影響制度，後來制度也就影響民族。環境與制度之間，也有同樣的情形。所謂影響，指的是形成、選擇、改變、阻滯，以至於消滅一類的能力的施與和接受。而就環境與制度加諸民族的影響說，最重要的是選擇。

我認為研究中國社會的變遷，包括近代與當代的蛻變在內，這三角關係是不宜一刻忘懷的。我們假定，在先秦時代，中國的環境、民族、與制度有過一個比較良好的配合，即三者相互之間，都有過良好的影響。秦漢以降，局勢發生了變動。最先發生變動、或變動早已發生而到此變本加厲的是環境一邊。此種變動的最初步驟大概是氣象學的與地質學的，我們姑不深究，我們所能確指的是黃河流域水旱災的頻仍。不斷的水旱災勢必在人民生活上引起變化：第一步是經濟的，即生活愈來愈逼窄艱苦；第二步便不免是生物學的，即人口中間，身心品性比較適合於逼窄的經濟生活的分子傾向於繼續生存蕃

殖。

(註二〇) Beard, O. A.: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 I, 298
(註二一) Lielt, 312

三十四年，四，十。

殖，否則傾向於死亡。這便是環境對民族發生了選擇的影響。二千多年來，這種選擇的影響從沒有間斷過，並且大有江河日下的趨勢。

反過來，民族對環境，卻說不上發生過多大的影響。這時期的前半葉裏，南方未開闢的土地還多，北方發生一次水旱饑饉，就促成一次人口的向南移殖。從此，南方的環境是逐漸的被開拓了，而北方的環境，除了開渠防河一些有限的努力而外，並沒有受到人力的更有效的修正控制，而越到後來，移民的出走越多，此種修正與控制的才力就越少，而北方環境的進化就越不可問。何以故？遭遇了災荒的人口，何以但知消極的逃避而不謀積極的防杜於前，挽救於後？要答覆這一部分的問題，我們就得說到文化與制度的一邊了。

北方環境的惡化本由於自然的原因，大概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制止。但人力與人謀應該多少可以挽回一些造化。所謂人力人謀，祇是少數人的聰明才智，和一時集合的大量勞力是不夠的，事先必須有比較長期的文化的支持與制度的培養，方有積極應付的希望。此方面所需要的人力人謀，顯然的牽涉到近代所稱的理工的學術。先秦時代是中國一切學術萌芽的時期，當初也還包括不少的理工的成分在內；不過，一方面可能因為道家之流對於自然主義講得太過，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儒家之流對於中庸適達的道理求得太亟，所以遠在春秋戰國年間，近代所稱爲『科學』或『理』的東西早就成爲『小道』，而『技

續，後來的發展累積自更無從說起（說詳拙稿「與中國文化」，自由論壇，第一卷，第一期）；到今日之下，祇落得，一條黃河還是像老殘遊記裏所說的貼滿着爛膏藥的一條大腿。大腿如此，大腿以外的通體瘡痍，也就可想而知。

這便引進到文化與制度，如何追隨在自然環境之後，在民族的本質上發生它那一部分的影響了。從春秋戰國時候起，我們的文化生活所走的路徑，最顯著的，似乎始終祇有上面所說的兩條，一是無限制的順適自然，二是在逼窄的經濟條件之下求其所謂中庸適達。演化論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理，所謂天擇，初則直接憑藉自然的種種勢力，終則勢必假手於文化的種種勢力，即以文化的事物為支點而引起軒輊的生育死亡。二十年來，論者分析中國民族的品性，就其不健全的部分說，大率集中於私、愚、病、亂等幾個特點，這我是同意的。我所不能同意的是，他們以此種特點為完全由於後天的養教無方，而我則以為一半由於先天的遺傳不利。遺傳的不利就是選擇的結果。在饑饉薦臻的自然環境裏，只有先天有更多的私、愚、病、亂的傾向的人纔適於生存——是第一步，是所謂自然選擇；極端順適自然或將就自然的人生觀又助紂為虐似的推進這種趨勢——是第二步，是所謂文化選擇，呼之為假手於文化的自然選擇，亦無不可。這都是屬於上文所稱第一條路徑的話。自然本有維持平庸分子的生育蕃殖的傾向，因為在尋常的環境裏，越是此類分子越能夠作多方面的消極的敷衍應付，越是適於生存——這又是第一步的自然選擇；中庸適達的人生觀，特別是久經誤解為「不偏不易」的中庸論，又在這一方面成為一股推波助瀾的很大的力量——這又是第二步的文化選擇。這是屬於第二條途徑的話。總之，由選擇而來的私、愚、病、亂等特點，以及一般身心能力的平庸，不能不說是二千餘年來民族所以適於生存的最大原因。但適於生存並不等於善於生存，「適」是自然的趨勢，「善」

「適」，卻不是同樣的「善」，也可以說善不善的判斷根本不適用於寄生蟲。中國民族的生存至今證明了「適」，至於和其它民族較量以後，究屬「善」到如何程度，則有非片言所能置答的了。

上文所說大部分是環境與文化如何先後影響民族的話，小部分則屬於民族如何影響環境；我們發見民族所受者甚多，而所施者甚少。其次應當一論先秦而後民族對文化與制度的影響又如何。這方面的影響比較對環境的要大得多，不過十之八九也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即其目的端在使修訂後的文化與制度可以進一步的幫民族的忙，教民族得以在越來越逼窄的環境裏，始終順適，永久維持。我們不妨舉兩三個例子。走了樣的中庸之道便是很好的一個。中庸之道原教我們一面「用中」而一面「執兩」的，即執中而有權的，但秦漢而降，尤其是宋代以還，民族積極培育的力量趨於衰弱，其對於一切二元或多元的局面的反應，往往祇有「左支右絀」或「左右做人難」之苦，而不復有「左右宜之」或「左右逢源」之樂，於是執中無權的種種看法，有如「天經地義」、「綱常萬古」、「以不變應萬變」……就應運而來。於是誤解的中庸論與平庸的民族性終於成為兩個互為因果的東西：哲學越講不偏不倚的中庸，民性便越趨於平凡庸碌；民性越趨於平凡庸碌，哲學便越不能不「修正」中庸之論，使不偏者愈益不偏，不易者愈益不易，如此往復推挽，構成了中國民族生活裏一個最不容易打破的惡性循環！

知足知止的觀念也是很好的一例。初則逼窄的自然經濟環境迫使我們不得不知足知止，繼則本性上比較能知足知止的人口分子不免在競存上多佔一些便宜，少受一些虧累，終則我們認為知足知止是最合理想的一部分人生觀，允宜垂為明訓，千古不磨。從此環境越逼窄，生活越艱苦，能知足知止與甘心知足知止的人便越多，而知足知止的哲學便越發牢不可破，更從而繁育知足知止的人與增添環境逼窄和生

日進有功的人生觀退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一動不如一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觀，其間的距離真不可以道里計；然而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極有來歷的；變動了的民族性格終於「修正」了民族的處世哲學。

但是最好而最具體的一例是我們的畸形發展的家族制度。在任何情形之下，求生的欲望總是最強烈的。生命的發展有它的高明度，有它的厚度，也有它的悠久度或綿續度。一個健全的民族生命是要求多方面的發展的：其個別的分子的種種努力則足以促進高明，增益厚度，造成鞏固而靈活的社會團結，和光明而甘美的文明進步；而血緣的世代嬗遞，便是悠久無疆的張本。我們的民族呢？大體平庸，分子中私、愚、病、亂者特多，而奇才異稟者特少，既有如上述，則個別分子所能努力的方向與此種努力的造詣都不免受很大的限制，博厚高明的生命發展也就無從說起了。但上面說過，求生的願望與生命的力量是抑制不住而總須覓出路的一路了。二千多年來，我們的生命力事實上幾乎是傾筐倒篋似的灌注在這一條路上。一個箇人，儘管活上七八十歲，忙碌了一輩子，其實際的成就，在社會上與文化看來，幾乎是等於零，事業說不上，學問說不上，甚至於對別人的一些熱鬧、對自己的一些享受，也說不上，說得上的祇有一點，就是在一脈相繩的生命上，他盡了一分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能事。這不能不說是一大事實。而促成這事實的文化的力量便是家族中心論與家族制度。時人喜

歡說到『國格』與『民魂』，這類東西究屬有沒有，我不知道，但就這裏所討論的一點言之，真像民族有一種整個的活力與綜合的心理，而此種活力與心理有它的自求多福的直覺，覺得既不能向高明博厚的方向發展，就只好向綿延悠久的途徑進行。換言之，畸形龐大與籠罩一切的家族制度不妨說是民族心理的一個補償，一個自衛機構，目的在把失諸東隅的收諸桑榆，否則豈不是就等於生命意志的消失與生命的放棄了麼？還有一層值得提出的，就是家族制度和上文所說的兩條文化生活的大路事實上有着密切的聯繫。生生不已，是自然主義最基本的部分；在箇人社會的二元之間，家庭是九執厥中之點；有了家族制度，這兩條路就合而為一，並且取得了充分表達的機構。

上文把自然或環境、人或民族、文化或制度的三角關係說了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環境與制度間的相互影響，我就不預備說了。因為這三分之一是大家最熟悉的。就環境對文化的影響言，地理學者與地理學派的社會思想家早已說得清清楚楚；而就文化對環境的影響言，則自理工學術昌明以後，到處可以看到例證，更自不言而喻。就歷史上中國社會說，大抵環境影響制度的地方極多，而制度改動環境的地方有限。民族對環境既但知一味的與一貫的作消極的位育，有如上述，它當然是拖了文化制度一致的順適將就；環境既予取予求，民族與制度就將錯就錯，掙扎的機會無多，奮鬥的努力更少；我們雖不見寄生蟲，我們走的多少是寄生蟲走過的路。

從羅斯福總統談到新時代的政治家

周經章

代的中國尤其需要這種典型的大政治家。我們思彼及此，實在有很多事情值得說。

先就羅總統的偉大之處，撮要言之：

(1) 政治風度 以精誠感召，成績表現，連任四次總統，創空前紀錄，不用武力權術，而使反對黨，孤立派，都莫可如何，傾心折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常為主角，仍不用縱橫捭闔手段，行堂堂之陣，張正正之旗，雖梟傑奸雄也為之畏威懷德。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不假暴力易，不用權術難，像他這樣真不愧為一個有政治風度政治道德的政治家。

(2) 政治理想 一反傳統的孤立政策，不為現實的功利所困，簽訂大西洋憲章，提出四大自由，以自由主義，和平原則，為他的努力方向，要把人類從混亂擾攘的局面，轉變到和平幸福的領域，不愧為一個領導時代的，有偉大理想的政治家。

(3) 政治業績 不僅是理想家，尤其是實行家，初次上台，就以「新政」解決了嚴重的失業問題，更把美國造成富強康樂之國；又一實的制裁侵略國家，領導這次大戰，訂定國際和平計畫，總而言之，是把理想與現實，價值與事業，打成一片的大政治家。

二 「霸術」與「王道」

「霸術」與「王道」是人類有史以來就潛伏着的兩大政治潮流，或則互為消長，或則相合並用，永遠支配着政治事業。這兩個名辭本為我國所固有，我們是借用來表達新的意義。所謂「霸術」就是缺乏有價值的理想，只以現實利害為依歸，為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術，這是一種「術」而非「道」。西洋自意大利人馬基維利(Machiavelli)出，乃集霸術理論之大成；中國則法家的刑名法術比較近於霸術，專門以霸術學理倡的，還不多見。然而無論中西，舊世紀的政治活動者，都

力很大，近世以至現代的政治人物，大多數都是以霸術來從事政治事業。至於所謂「王道」就不同了！「王道」是不計近功淺利，有遠大的政治理想，旨在造福人羣的政治主義，是一種正大光明的「道」，要講價值，要談道義。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所謂修、齊、治、平之道，以及近代西洋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都可以說是「王道」。「王道」本為人類的政治理想，比較難於實際化，且又常被假借，如此次戰爭，日寇即以其假造的所謂「王道」，麻醉人心，交亂聽聞，實則為一種強盜作風，絲毫與「王道」無涉。新時代業已到來，現在的「王道」是什麼呢？現在的「王道」就是大家渴望已久的自由主義、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只有這些才是人類崇高的政治理想，能夠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羅斯福總統的偉大，也就在能實行這些「王道」，他恐怕是國際間最不好用霸術的政治家了。要想作新時代政治家的人們！「霸術」的舊夢應該醒來，趕快擔負起「王道」的重任！

三 政客·陰謀家·政治家

舊世紀的政治舞臺上充滿了政客、陰謀家，卻很少有真正的政治家，這三種人本來都是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不過所抱的目的和所用的方法大有分別：所謂「政客」是只以一己的升官發財為目的，用種種吹拍鑽營的手段，取巧投機，惟利是圖者；「陰謀家」則常為政治上的幕後人物，亦只在謀少數人的成功，用陰險的手段，詭詐的計謀，實行其「霸術」。這兩種人的同點是都沒有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為目的不擇手段，以「霸術」為依歸。異處則是陰（陰謀家）顯（政客）的不同，程度上的差異（陰謀家比政客險詐）。中國的黃老哲學成為後世陰謀家的護身符，近人所倡的「厚黑學」——臉厚心黑，到又是政客們的煉身寶筏。曠觀近代以來的政治人物，大多數都在這兩種典型之中。所謂「政治家」就大異其趣了！首先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遠

大的政治眼光，繼之以宏闊的政治風度，堅定的政治道德，沒有領袖心，「合則留，不合則去。」其出處進退都可以為天下法，又有若旋乾轉坤的本領，撥亂反正的力量，或救一世之疾苦，或開百年之太平，總之，犧牲一切，實現其政治理想，為大多數人謀福利，此之謂政治家。以這個尺度來衡量人物，羅斯福總統是當之無愧的。現在我們要實行民主政治，正需要真實的政治家，政客絕不能實行，陰謀家更不能實行，只有政治家能夠領導政治，實行民主！

四 新時代的政治家

現代法學之特徵

所謂現代法學，其首先須加以確定者，為「現代」在時間上的範疇。歷來法學家或認法律為自然法則，或認法律為歷史記載，或認法律為社會事實，均作為連續性的研究。世紀的更易與時代的進展本係牽連不斷，只能為說明上的便利略予劃分，要非有截然的界限可以樹立。即在若干法學家著作中，雖有研討現代法學的專著，而各人的時間分際不但不同，且相差甚巨。如司丹本拉的「現代法學之根本趨勢」，係自十七世紀的啟明時代起。而彭勒加斯的「法律科學與浪漫主義」，則僅自一八八〇年敘起。

就立法方面劃分時代，則一八〇四年的法國拿破崙法典，足為前一年的界石，一九〇〇年的德國民法典，足為後一期的起點。拿破崙法典是現代成文法典的最早集大成者，凡法國大革命前後法學思想，在法典中已可網羅無遺。德國民法典較拿破崙法典遲後將近一百年，這一百年的法學知識與方法，已有極多的進步。而一九〇〇年又是二

新時代的政治家要以新時代的政治理想為理想，新時代的政治理想是普遍而真實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平主義，應該效忠致力於這些理想的實現。世界各國是如此，中國更不能兩樣。前面說過，這些政治理想就是現在的「王道」，新時代的政治家應徹底放棄「霸術」，實行這些「王道」，好弄「霸術」的政客和陰謀家，在新的政治潮流中，只有被沖倒，被淘汰，惟有政治家能把握新時代，領導新政治。

我們大聲疾呼的說：今天中國所需要的絕不再是政客，絕不再是陰謀家，而是把握新時代的政治家！

阮毅成

洗禮，成為科學的一支，是一八八〇年以後的事，到一九〇〇年，已經成長。現代法學大師狄驥的偉著國家論，即係於一九〇一年出版第一冊，自有此偉著問世，過去所謂玄想學派，觀念學派，宗教法，個本主義新康德法學，方才屏斥淨盡。故我人暫以二十世紀的開始為現代的開始。

二十世紀與以前的幾個世紀有什麼不同呢？勞德在其所著「自由主義之損棄」中說：「二十世紀的特徵，剛剛和先前三世紀成一個對照。十七八世紀的時候，人們所信賴的是性理，在十九世紀，人們所信賴的是進化。……到了二十世紀……沒有信賴，和無所信賴，這便是現代的特色。」一般學者亦謂懷疑與相對，是二十世紀的特色。因為懷疑，所以前世紀已經確定了原理方法遂起了動搖，因為相對，遂將過去的種種絕對的假定，予以變更。

茲就法學方面，說明這一種特徵的表現：